

一個藝人，各自表述： 1983 年侯德健潛赴中國的媒體論述 策略*

楊錄民**

摘要

本研究以 1983 年侯德健潛赴中國為例，探究主流報紙如何論述這起涉及國族認同爭議的顯例。透過 Norman Fairclough 批判論述分析，研究發現主流報紙在事件前期出現「去政治化」報導，意圖將事件個人動機化；而在事件後期報導則出現「反共」的論述特徵。本研究進一步透過輔助資料如黨外雜誌與侯德健的自傳，來比較不同的論述視角，則更能夠凸顯主流報紙避談政治因素與認同因素，盡量將事件發展導向有利於當權者的論述特徵。再者，以侯德健為代表有別於官方意識形態的中國國族主義，則彰顯 1980 年代國族認同的分歧樣貌。

關鍵詞：中國意識、批判論述分析、侯德健、新聞報紙、黨外雜誌

* 作者感謝匿名評審與編輯委員會多次指正與協助，使本文臻於完善。

** 楊錄民為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服務創新與行動設計中心博士後研究員、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Email: michaeljmyang@gmail.com。

投稿日期：2019/10/31；通過日期：2020/12/16

壹、研究動機與目的

1983年5月，紅遍華人圈的民謠歌手兼創作人侯德健，利用到香港宣傳唱片的機會，逕自轉赴中國。侯德健突如其來的舉動，違反了國民黨政府禁止人民往來對岸的法令，並且給官方帶來難堪，因為他曾是國民黨刻意吹捧的「愛國典範」。侯的創作《龍的傳人》在1978年中美斷交時刻，曾經鼓舞了臺灣社會面臨國際孤立抑鬱而生的認同危機。歌詞「古老的東方有一條龍，它的名字就叫中國。古老的東方有一群人，他們全都是龍的傳人……」投射出對中華國族的再認同。然而他卻在最意氣風發的時刻選擇「投共」，一夕之間從國族英雄淪為叛國匪徒。

其實侯德健在當時並非個案，而是一系列國族認同背離中華民國在臺灣的法理現實的一個顯例。1980年代前後，有軍人林毅夫，在1979年抱著籃球從金門泅游到廈門。隔年，隸屬於空軍部隊的黃植誠，駕駛F-5F戰鬥機「迷航」飛越臺灣海峽，迫降對岸。侯德健出走的同一年間，亦有導演李翰祥不顧政府三申五令，偷渡到中國拍攝《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火龍》等一系列清宮片。這些人曾經是國民黨主政時刻意扶植或吹捧的文化、政治菁英，卻寧願投靠只有血緣關係，但因國共長期分立而變得陌生的「祖國」。

侯德健出走的時間，同時也是中華民國面臨美國斷交、美麗島事件，在外交與內政雙重打擊而出現統治危機的關鍵時刻，黨外運動在此時逐漸集結為檯面化的反對勢力。侯德健的出走還在黨外雜誌引燃著名的臺灣意識論戰，被認為是臺灣意識浮上檯面，並對中國意識展開話語競逐的轉捩點，過去已有諸多研究討論（若林正丈，2008／洪郁如、陳培豐譯，2014；施敏輝，1988；陳昭瑛，2009；蕭阿勤，2012；Hsu, 2013）。有別於關注論戰本身，本研究則圍繞「侯德健出走」如何受到特定機構論述，特別在威權時代的主流紙媒如何去報導這件涉及國族認同議題，並且令執政者難堪的事件？再現了何種國族意識形態？而新聞與評論內容與當時的社會環境產生何種互動與連結？

為了深度詮釋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與社會情境，本研究透過批判論述分析概念，並採用鄭怡世（2019）所整理歸納的Norman Fairclough 批判論述分析的五個操作步驟「蒐集文本」、「分析文本

中的表述」、「覺察表述所立基的視角」、「探悉文本中的言說鏈及意識型態」、「揭露論述中權力的效應」，探究媒體論述與意識形態，以至於社會結構三者之間的關係。

貳、文獻回顧

一、媒體建構與國族主義

Gellner 主張國族主義是一項政治原則，政治與國族的組成單位，兩者必須等同一致；國族主義也是關於「政權正當性」的理論，被宣稱為一國族的界限往往不會超越國家政體的疆界，因此國家政體是構成國族主義存在的重要元素（Gellner, 1983／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頁 1-2）。Gellner 將國族區分為「文化」與「主觀認定」兩種定義，前者意指當兩個人分享同一文化時則他們才屬於同一國族，後者則是只有在兩個人「承認」彼此屬於同一個國族時，他們兩個才屬於同一國族，因此國族的主觀認定又涉及了信念、忠誠與團體歸屬。

Gellner 對國族的定義，彰顯了國族主義的形成，在於個人的國族認同抉擇的操作化過程。因此綜觀當代國族主義研究多聚焦於「國族認同形成的過程」，而非圍繞在國族主義的本質（如血緣論）刨根究柢，其中媒體對國族認同建構的作用，被認為是當代國族主義出現的重要元素之一，尤以 Anderson 提出的「想像的共同體」概念最負盛名。

Anderson 透過對近代國家起源的歷史爬梳，論證國族主義是近代透過「想像」建構的產物，他主張國族的「想像」具有三種特徵：第一是想像具有「疆界」，包括特定人口與領土界線；第二是想像的政治實體是「主權國家」，且這個政治實體是自由而不受到他者干涉；最後是這個想像的「群體」忽略人類所具有的階級與剝削關係，在國族的號召下，彼此成為站在同一水平線的同胞，而這樣的情誼使人們能夠為自己的群體甘願犧牲奉獻（Anderson, 1991/2007, p. 257）。

在構成想像共同體的過程，Anderson（2006／吳歡人譯，2010）強調近代傳播科技在國族主義形塑的過程扮演要角。近代傳播科技的革新，配合資本主義的擴張，使小說、報紙等印刷媒體得以大量發行，並且為「重現」國族這種想像共同體提供了技術手段。例如報紙，它大量生產、方言印製，以及非耐久財的特性，使閱讀報紙的行

為創造了群眾儀式——即讀者消費報紙的同時，確信在特定區域中還有無數的人也正在閱讀這份報紙，因而經驗想像的儀式，創造了一個匿名的共同體，一個共同擁有此時此地，以及特定語言性質的群體，進而昇華為國族。

在研究戰後臺灣國族認同的形塑，研究者也多關注於媒體如何建構臺灣社會的國族意識。蕭阿勤（2012）指出國民黨政府在二戰後接收臺灣，便以控制語言、傳播媒體，試圖灌輸官方中國意識於臺灣社會，塑造想像的共同體。第一任臺灣省省長陳儀甫就任，便將臺灣「去日本化」及「中國化」作為他的施政主軸。陳儀推動國語化政策，由教育上推行說國語、用國語、讀中國歷史，藉以根除臺灣人的殖民文化。

繼之，廣播與電視也成為政權統治者藉語言純化國族意識的工具。蘇蘅（1993）研究臺灣廣播電視語言政策發展，指出廣播與電視的方言節目緊縮期（1972-1987），為配合政府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以方言節目水準低劣為由，限制方言節目播放比例。例如 1972 年教育部文化局規定電視「方言節目限於 16% 以下」與「黃金時間方言節目不得超過一小時」（同上引，頁 258）。1976 年頒布施行的《廣播電視法施行規則》中明文規定：「電臺對國內廣播應用國語播音的比例，廣播電臺不得少於 55%；電視電臺不得少於 70%。使用方言應逐年減少。」法規內容彰顯了政權統治者希望廣電媒體配合推行國語政策，並確立以國語做為主要播音語言（同上引，頁 241）。國民黨政府透過單一語言（國語／北京話）的傳播型塑中華國族意識想像的共同體。

而平面媒體在戰後臺灣社會同樣發揮形塑國族認同的重要影響，例如 1980 年代聯合報系與中時報系便延續 1970 年代，以「中國」文物為象徵符號進行國族召喚，試圖將臺灣民眾改造為符合國民黨政府標準的「中國人」（江詩菁，2005）。但儘管處於戒嚴與報禁（限張、限印、限證）環境，仍有報刊如《自立晚報》敢於刊登敏感新聞與文章，因而數度被國民黨政府勒令停刊（王天濱，2003）。本研究即關注當時的主流報紙如何報導侯德健潛赴中國？不同的報紙是否出現差異化報導？報導內容是否涉及國族意識？其內涵如何？

二、戰後臺灣的國族認同

戰後臺灣的國族意識主要受到 1949 年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內戰戰敗，政權遷移到臺灣所帶進的「官方中國國族主義」所形塑。該國族主義往後成為鞏固國民黨極權政治的統治合法性之重要工具，並被推及至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反之，臺灣意識或臺獨意識雖然透過日治時期的自治運動、白話運動，以及日本戰敗後與二二八事件期間，島內零星的臺獨運動能夠窺知一二（李筱峰、林呈蓉，2005；吳叡人，2001；陳培豐，2006；陳翠蓮，2008），但是二二八事件後多數臺獨知識份子避居海外，再加上戒嚴導致臺灣形同對外封閉的空間，使得臺灣意識在島內的發展受到侷限，島內倖存的臺獨人士則長期噤聲，臺灣意識直到 1980 年代以後才開始被公開討論（陳佳宏，2006）。

直到 1970 年代起了變化，以美國為起點的留學生保釣運動，與一連串中華民國斷交事件（退出聯合國、臺日斷交、臺美斷交），都影響臺灣知識分子的思想，轉而促成「回歸現實」的時代。受到美國保釣運動的啟發，臺灣保釣運動的出現促成知識分子回流，轉而開始關懷本土社會以及要求政治革新。同樣地美國保釣運動的「左傾」也影響了臺灣知識分子的運動路線，¹《夏潮》雜誌的出現代表海外左翼思想在臺灣的再出發，宣揚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的主張，走向社會實踐路線的中國國族主義實踐，並與國民黨政府官方版的中國國族主義產生差異（邵玉銘，2013）。

保釣運動與外交危機也促成鄉土文學論戰及校園民歌運動等一系列由下而上的愛國愛鄉運動，除了反映 1970 年代臺灣社會集體的認同焦慮，運動過程還彰顯出知識分子對國族認同的探索、分裂與抉擇。1970 年代的校園民歌運動反映出對中國認同的再確認。例如李雙澤的《少年中國》、楊弦的《鄉愁四韻》和侯德健的《龍的傳人》，歌曲中皆蘊含濃厚的中國情懷。《龍的傳人》歌詞表達對中國國族身分肯定，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強烈認同，深受國民黨政府的讚揚與推廣（葉月瑜，1999）。然而同樣由外交危機所引起的鄉土文學論戰、黨外運動、美麗島事件，以及 1980 年代黨外雜誌的臺灣意識論戰等，則凸顯有別於中國國族意識的認同光譜。

1970 年代文學路線的論戰，本土知識分子與部分外省二代作家面對臺灣在國際逐漸孤立的局勢，開始檢討移植西方現代文學到臺灣的適用性，轉而向內開展鄉土文學，建立本土認同。儘管受到擁護現

代主義的外省作家嚴厲批評，稱其為工農兵左翼文學、分離主義文學，他們仍認為唯有落實在臺灣民眾現實生活的鄉土文學，才能是餵養臺灣人的精神食糧（葉石濤，2003）。

但是同屬鄉土文學陣營的作家群對於「鄉土文學」的定義卻南轅北轍。葉石濤曾在 1977 年 5 月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一文於《夏潮》雜誌，他從「土地情懷」與「被殖民史」展開論述，強調臺灣鄉土文學的獨特性，並提出鄉土文學背後的「臺灣意識」特徵（葉石濤，1977/1979）。該文立即引來同為鄉土文學陣營的陳映真反駁，他否認臺灣鄉土文學的獨特性，並警告過度強調臺灣意識無異於鼓吹「分離主義」，指出臺灣鄉土文學史僅只是「在臺灣的中國文學史」（陳映真，1977/1984）。從鄉土文學論戰延伸到臺灣文學史的特殊性爭論，便為 1980 年代臺灣意識浮出檯面提供社會條件。

在政治運動路線的轉變，蔡篤堅（1996）將 1978 年做為臺灣政治變遷的分水嶺。1978 年與美國斷交導致中華民國的國際關係走向新的態勢，而因斷交延期「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以及其後發生中壢事件的影響則促使黨外政治運動改變策略，由體制內的選舉經營路線走向體制外的群眾運動。湯志傑（2007）演繹了臺美斷交國民黨的政治合法性危機與黨外路線走向群眾運動的激化，最終導致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的發生。

美麗島事件以及其後的省議員林義雄滅門慘案等，接踵而來的國家機器運作的體制暴力，使得黨外人士從追求體制內的民主化路線，轉而尋求更深層的國族意識革命：「若是在承認『中國國家體制』框架的前提下要求民主化卻仍遭拒絕，那麼這個體制框架本身就必須被批判；若是在這個意識形態框架內追求『承認與尊重』卻仍遭拒絕，那麼這個意識形態本身就必須被挑戰（若林正丈，2008／洪郁如、陳培豐譯，2014，頁 192）。」

面臨國際孤立以及一系列涉及認同危機、認同轉變的政治事件，為 1980 年代臺灣社會的認同矛盾跟衝突提供了背景條件。而 1983 年侯德健出走所引發在黨外雜誌的臺灣意識論戰（實際稱為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支持者之間的論辯更為清楚），受到許多研究者關注，並將其定調為臺灣島內主體建構與具體化的里程碑，是反抗中國論述的本土化運動（若林正丈，2008／洪郁如、陳培豐譯，2014；施敏輝，1988；陳昭瑛，2009；蕭阿勤，2012；Hsu, 2013）。

相反的侯德健出走在當時的紙媒報導則罕有研究者重視。本研究認為觀察主流報紙報導侯德健事件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的社會氣氛；背後隱含的主流意識形態（相較於黨外雜誌偏向黨外政治菁英的意識形態再現），以及在避免觸怒執政者龍鬚之下如何報導這起涉及國族認同議題的「叛逃」案例，特別是侯德健在臺灣社會具有影響力，且曾經被政府勉勵為「愛國典範」。該研究結果預期能夠補足我們對1980年代政治與社會結構、媒體與國族認同之間的互動樣貌。

三、批判論述分析

批判論述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一詞源於英國學者Norman Fairclough 在1995年出版的同名專書，而該術語後來成為框架整個學術社群的代名詞。Wodak（2001）在《批判論述分析方法》（*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說明批判論述分析主張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的形式，並重視語言的脈絡。因此該分析關注社會過程與結構如何影響文本生產，以及在這個過程與結構之間，個體或群體做為社會主體，如何從與文本互動的過程創造意義。由於批判論述分析始於對社會問題的關懷，並重視優勢與弱勢群體語言與權力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因此其研究關懷主要在性別、種族、主體認同等議題。

與傳統論述分析最主要的差別在於，批判論述分析加入「脈絡」的分析。傳統論述分析主要處理文本由字句、段落乃至全篇的文句連貫與邏輯連貫的課題，儘管仍有涉及處理「脈絡」的部分，但傳統分析關注的脈絡僅著重字句之間的上下文脈絡，而沒有處理語言外的社會情境對文本所造成的影響，因此傳統分析具有「去脈絡化」的特色。相反的，批判論述分析則關注特定的社會背景如何影響文本的產製與呈現，所以在分析論述時無法避免的需要瞭解更多文本之外的社會元素，因此批判論述分析實際是「脈絡化」的論述分析（倪炎元，2011）。

批判論述分析並非無中生有，事實而言它雜揉相關理論學派的重要概念，例如該分析強調論述的社會相關性，啟發自語言學家Mikhail M. Bakhtin，他認為任何形式的表述，無論是口說、文字，都是在吸納他人的話語資源，並結合自身評估，進一步吸收、再造與重讀的產物（鄭怡世，2019），Fairclough 將其延伸為文本的「互文性

分析」(intertextual analysis；於第三章第二節分析方法詳述)。在論述的辯證性則受到 Michel Foucault 的系譜學分析影響，Foucault 指出知識的生產由論述主導，論述則為權力實踐的一種類型，就如同在軍隊中權力透過規訓實踐於肉體各部位的操控，以達成肉體的順從 (Foucault, 1979／劉北成譯，1992)，無論是論述與規訓都是權力的符號化時機。

再者，批判論述分析關注挖掘論述背後的社會錯誤，尤其是為權力服務的「意識形態」，則受到 Louis Althusser 意識形態霸權理論的啟發。Althusser 將意識形態視為支配／統治階級的意識 (consciousness)，並成為建構人們認識世界的方式，進一步產生自我規訓，以致喪失主體性與反抗性 (鄭怡世，2019)。因此以 Fairclough 為代表的批判論述分析便在吸納各家學派的重要理論資源後，特別將分析焦點放在文本的互文性分析、文本與社會脈絡的關係、以及文本所彰顯的意識形態。Fairclough (2010) 更指出批判論述分析的宗旨還包括匡正社會錯誤，透過詮釋與解釋文本中揭露的意識形態，進而生產正確的知識以矯正因權力不平等所製造的社會錯誤。

批判論述分析學群之中研究者各自發展出不同的理論關懷與分析架構，諸如 Fairclough 選擇批判社會學理論、Bell 選擇文學研究中的敘事學理論、van Dijk 選擇認知心理學理論、Wodak 選擇歷史社會學理論 (倪炎元，2011，頁 84)。本研究為了深度詮釋新聞媒體論述背後的國族意識與社會脈絡，採用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取徑。

在國族意識與族群問題，國內著作已有數篇使用 Fairclough 早期的論述分析架構「文本／論述實踐／社會實踐」進行分析 (吳孟芬，2008；林世達，2010；姚竹音，2016；黃彥文、姚明俐，2017；潘志煌，2011；賴英泰，2012)，但這些著作共同反映了分析過程所出現的研究問題：例如各研究對於互文性分析的掌握出現不同的解讀與應用，多數研究將互文性分析關注於論述與時空背景的呼應 (吳孟芬，2008；林世達，2010；姚竹音，2016；潘志煌，2011；賴英泰，2012)，但卻沒有更詳細地解釋兩者如何互動，也因此難以看見論述之間吸納與競逐的動態過程。唯有黃彥文、姚明俐 (2017) 在觀察 2014 年課綱微調爭議時，點出知識分子的報紙評論如何挪用社會事件 (陳冠華自焚案) 與民意調查 (臺灣人認同傾向)，將課綱微調爭議

從教育議題提升為社會議題、政治議題與國族議題。針對研究問題，本研究認為主要因素與研究者只選用單一文本分析有關，正如吳孟芬（2008）在其研究建議指出「可選用不同的樣本進行交互文本分析」（同上引，頁 186），若能夠採納不同文本進行分析則更能夠看見論述之間的動態競逐過程。例如在分析歷史教科書時，也能夠採納不同出版社的歷史教科書，以及當時相關報紙評論，反過來凸顯特定教科書文本所要強調的意識形態樣貌。

再者，雖然都是使用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但文本的分析重點與分析順序則依研究者個人偏好而產生差異。也因此，有研究者嘗試整理 Fairclough 的分析架構與分析重點，嘗試建立出一套標準的文本分析順序，說明各步驟的分析要點。

其中鄭怡世（2019）以 Fairclough 批判論述分析觀點為主，歸納出五個執行批判論述分析的操作步驟：（1）蒐集文本，說明選擇文本的社會位置；（2）分析文本中的表示，即從語言學單位分析字、詞、句、段落的使用與鋪陳，以理解行動者（言說主體）藉由文本所欲表達的重點；（3）覺察表述所立基的視角，則在於透過拆解所欲表達的重點，將之歸納並抽象化成數個概念，而得以覺察行動者的論述所立基的視角；（4）探析文本中的言說鏈及意識型態，分析文本採用的視角呈現出什麼樣的言說鏈、是否有其他視角，以理解文本再現出什麼樣的意識形態；（5）揭露論述中權力的效應，在於探究論述形成的脈絡，吸納、重組、排除了哪些論述，而論述之中的行動者如何被論述編排、看待與理解。

鄭怡世提供了一套清楚而符合批判論述分析宗旨的操作方法，但是鄭以〈曹小妹母攜女燒炭自殺事件的調查報告〉為觀察文本，在實際演練各分析步驟時存在研究限制。例如在探析文本中的言說鏈，鄭怡世雖然引經據典說明對於兒少保護的觀點區分為「兒童保護」與「家庭服務」兩種取向，而監察院的調查報告論述背後呈現出以「兒童保護」為依歸的意識形態，但卻沒能夠凸顯出批判論述分析所強調的文本之間如何進行競逐、重組、吸納與再配置的動態過程。再者，Fairclough 在 2006 年出版的《語言與全球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一書將文本視為「論述交鋒雜交混和體」（interdiscursively hybrid），強調文本之間如何相互作用形成新的雜交混血論述，在鄭文中付之闕如。究其原因，如前文提及的通病，在

於鄭怡世所選擇的文本只是單方面行政機構的調查報告，難以看到多樣化論述之間的競逐。

四、小結

前述文獻對本研究的啟發在於，首先批判論述分析適合用於觀察文本背後所隱藏的意識形態，並詮釋該意識形態出現的社會脈絡。其次，戰後臺灣官方與民間的國族認同呈現出兩股或更多的意識形態，而 Fairclough 強調觀察文本之間的互文性，以及論述如何吸納與重組其他論述資源而形成論述交鋒雜交混和體，則適合用以探究不同國族意識之間透過論述彼此競逐的脈絡。

最後，本研究借用鄭怡世的批判論述分析五步驟進行事件分析，而為了觀察文本之間的互文性特徵與論述競逐，本研究雖然以主流報紙為主要分析文本，但也加進黨外雜誌與侯德健自傳對事件的評論與描述，以協助解釋主流報紙所反映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特徵。本研究試圖回答以下問題：

- (一) 主流報紙如何報導侯德健事件？
- (二) 各家報紙在報導侯德健事件是否出現差異？
- (三) 透過不同文本的比較（黨外雜誌、自傳），主流報紙凸顯了哪些論述元素與意識形態？其反映了什麼樣的社會特徵？

參、研究方法

一、文本蒐集

本研究選擇報紙為觀察對象，包括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民生報、自立晚報與聯合報五家在當時兼具規模與代表性的主流報紙。在資料蒐集過程，本研究蒐集 1983 年 6 月 1 日至 1987 年 12 月 31 日相關報導，觀察主流報紙如何報導侯德健潛赴中國初期與他在中國發展的境遇。透過關鍵詞「侯德健」搜尋報紙資料庫（中央日報全文影像資料庫、中國時報全文報紙影像資料庫、自立晚報資料庫、聯合知識庫），共獲得 39 篇相關報導。各報篇數如表 1：

表 1：報紙篇數統計

報紙	篇數 (1983.6.1-1987.12.31)
中央日報	1
中國時報	3
民生報	19
自立晚報	7
聯合報	9
總篇數	39

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參考輔助資料黨外雜誌（如《前進》、《夏潮論壇》），侯德健在 1990 年出版的自傳《禍頭子正傳》，透過比較不同的文本論述以理解主流報紙所欲凸顯的論述內涵與意識形態。

二、分析方法

本研究為了深度詮釋論述背後的意識形態與社會脈絡，採用 Fairclough 的批判論述分析取徑。他早期提出三個向度的論述分析架構，文本、論述實踐、社會實踐，被國內研究者多次引用來觀察社會議題與教育議題（吳孟芬，2008；林世達，2010；邱婕歆、吳連賞，2017；姚竹音，2016；黃彥文、姚明俐，2017；潘志煌，2011；賴英泰，2012），不過 Fairclough 在 2006 年出版的《語言與全球化》（*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一書，對自己原先提出的分析構架予以修正，並提出社會分析的三層架構—社會事件（social events）、社會實踐（social practices）及社會結構（social structures）。

社會事件指的是具體的生活事例，包含社會正在發生與具體發生的行動與真實事件。社會結構指抽象、普遍且持久的社會特徵，例如生產形式、階級結構、性別關係等。社會結構是一種「可能」，而社會事件則是「事實」，並不是所有社會結構的「可能」都會成為社會事件的「真實」，它必須透過社會實踐這個中介來達成。社會實踐是事件發生的習慣、習俗，以及事件發生的制度化方式。社會實踐與特定制度（如法律、規章）、特定組織（如學校、公司）產生連結，且作用或發生於社會生活中特定的區域，例如學校、公司、媒體、特定場域等（Fairclough, 2006, pp. 25-26）。舉例記者撰寫報導的論述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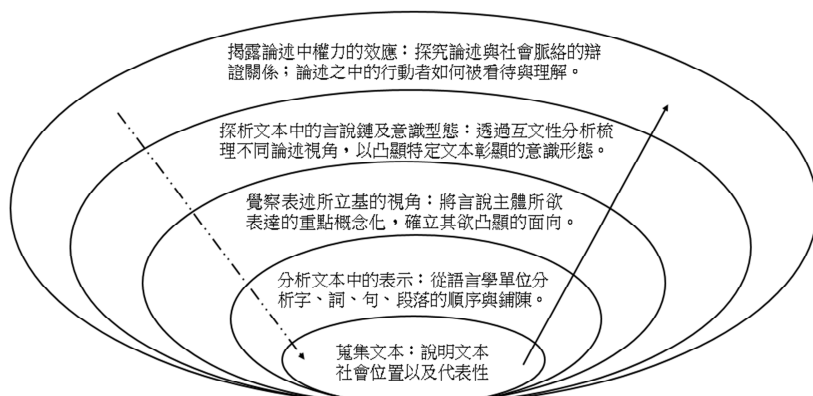
亦是一種社會實踐，而這個過程與記者身處的報社組織、制度規範相互連結。

「文本」建構了社會事件的符號化時機，而「論述秩序」（orders of discourse）則是社會實踐與社會結構語言的符號化時機。Fairclough 特別關注文本的互文性，意指其他文本如何參與或被納入某一特定文本的生產過程。Fairclough 借用互文性概念進一步發展為對脈絡的「跨文本分析」，將納入脈絡的所有元素「文本化」，無論是社會的、文化的、心理的抑或是歷史的情境因素，都成為與特定文本交錯的互文本（倪炎元，2011）。因此 Fairclough 指涉的「文本」不侷限於單純書寫的文本定義，還包括言談、電視廣播、網路、影像、身體語言等，皆是社會符號化的時機。且特定文本的生產與其他文本具有辯證性，文本是由不同權力與資源在論述次序之間交互角逐與競爭下的結果（倪炎元，2012）。

Fairclough 進一步將文本視為「論述交鋒雜交混和體」，文本的生產是各種不同的論述交互作用下的結果，因而形成新的雜交混血的論述、文類與風格，並融入既有的論述次序中（倪炎元，2012，頁33）。例如新自由主義學派所提倡的全球化主義，在面臨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時，為化解其論述遭到質疑，除了撇清責任歸屬，更吸納 1990 年代後期興起的知識經濟概念，指出「知識」、「技能」、「創新」為增加競爭力的重要元素，而政府的角色則是創造該環境條件。於是在融合知識經濟概念之下，增進國家的競爭力成為了全球化主義面臨金融風暴的解套手段（Fairclough, 2006）。

本研究採用鄭怡世（2019）整理的五個執行批判論述分析的操作步驟—蒐集文本、分析文本中的表示、覺察表述所立基的視角、探析文本中的言說鏈及意識型態、揭露論述中權力的效應，且更為關注形成言說鏈過程文本之間的互文性與論述交鋒雜交混和體。圖中箭頭實線表示分析步驟的順序，虛線則是強調各步驟之間具有相互影響的特性。本研究對於操作步驟說明稍作改編如下圖 1：

圖 1：批判論述分析的操作步驟



資料來源：〈揭露文本的沉默性：以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應用於「曹小妹事件調查報告」〉，鄭怡世，2019，《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9：77。

在文章安排，第四節為「蒐集文本」步驟，說明報紙文本的社會背景與代表性；第五節為「分析文本中的表示」跟「覺察表述所立基的視角」，分析文本的表達重點並加以概念化為論述特徵；第六節「探析文本中的言說鏈及意識型態」，透過梳理不同的論述視角，得出報紙論述特徵背後的意識形態內涵；第七節「揭露論述中權力的效應」，則歸納文本的互文性脈絡，詮釋論述特徵的社會背景。

肆、回歸「祖國」的龍

本研究圍繞在侯德健潛赴中國事件展開媒體論述分析，根據「蒐集文本」步驟，以下簡要描述事件背景，並說明選擇文本的代表性。

1983年5月19日，侯德健接受香港代理商永聲公司邀請，到港宣傳新作《龍的傳人續篇》唱片。在為期十天的宣傳結束後，他沒有返臺，滯港期間行蹤成謎。直到北京《中國新聞社》在6月4日發布消息—「來自臺灣的校園歌曲作曲者侯德健抵達北京」，始揭露侯德健的行蹤（聯合報，1983年6月10日）。然而國內社會接收到消息則要延宕至兩天以後，由《聯合報》在6月6日率先報導侯德健已從香港轉赴中國（聯合報，1983年6月6日）。

侯德健反常舉動在國共對峙的敏感時刻，引發國內新聞媒體諸多

揣測，且帶給國民黨政府極大的難堪，這源於他的作品《龍的傳人》。這首歌讓他成為當時臺灣家喻戶曉的愛國歌手，並投合國民黨政府極力宣傳的中國意識，成為統治集團刻意栽培的青年典範。因此侯德健原本作為歌手的身分，則參雜更多來自政府與社會認同期待的政治元素，然而他的「投共」行為卻一反常態。

根據侯德健自述，《龍的傳人》作曲源於 1978 年 12 月 16 日中美斷交，歌詞內容表達出中國人應該自立自強，再也不依賴外國人（侯德健，1978 年 12 月 26 日）。歌曲起初由侯德健自彈自唱，並沒有獲得市場矚目，直到 1980 年李建復翻唱，出版《龍的傳人》專輯，旋即在市場造成極大迴響。華視當時收視率最高的綜藝節目《綜藝一百》，在 1980 年 7 月至 1982 年 3 月舉辦民歌與流行歌曲排行榜「創作歌謠排行榜」，《龍的傳人》蟬聯 14 週冠軍，後來被另一首愛國歌曲《中華民國頌》搶走衛冕寶座，但《龍的傳人》後續仍獲得第 26、27、30、32 週冠軍，在那個時代的臺灣社會充斥愛國情緒可見一斑（民生報，1980 年 7 月 21 日）。

於是侯德健的愛國形象隨著《龍的傳人》的風行傳遍大街小巷，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在 1980 年 8 月 4 日成功嶺演講，特地以《龍的傳人》開頭，並將歌詞修改，企圖號召軍人的國族認同感：「百年來屈辱的一場夢，巨龍酣睡在深夜裡。自強鐘敲醒了民族魂，臥薪嚐膽是雪恥的劍。爭一時也要爭千秋。挑重擔才是龍的傳人。巨龍巨龍你快夢醒，永永遠遠是東方的龍；傳人傳人你快長大。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²」（宋楚瑜，1980 年 8 月 5 日）

歌詞被竄改並非首例，《龍的傳人》歌詞在發行前，就曾被新聞局要求修改。歌詞裡「姑息的劍」的原詞是「洋人的劍」。據說是因為新聞局唯恐中美斷交之際，涉及批評美國的歌詞過於敏感（侯德健，1980 年 8 月 27 日）。

新聞局有權要求修改歌詞，源自 1975 年 12 月 26 日頒行的《廣播電視法》，其中第 25 條：「電臺播送之節目，除新聞外，新聞局均得審查；其辦法由新聞局訂之。」而早在廣電法訂定前，新聞局已於 1973 年成立「歌曲出版品輔導工作小組」及「廣播電視歌曲輔導小組」，分別辦理輔導及審查歌曲工作（自立晚報，1980 年 1 月 16 日）。一首歌要出版與公開播放，必須要先送到新聞局「出版事業處」審查，通過後再送「廣播電視處」審查。依法令規定，出版處通

過就可以灌唱片、錄音帶；等廣電處通過了，才准許在電視、電臺播放。這代表如果只有出版處通過，那等於「不通過」，因為一首歌不能公開播放，唱片的銷路一定不佳（林容，1983年6月18日）。

1982年9月，侯德健出版專輯唱片《龍的傳人續篇》（原名為「天地父母」），原收錄七首歌曲，但只有三首通過審查，遭刪除的有《高速公路》、《未來的主人翁》、《潮州人》、《給魏京生》，一個專輯唱片只剩三首歌，形同判了專輯發行的死刑。而即便專輯上市出現問題，隔年6月侯德健仍接受香港代理商邀請，到港宣傳新作，但是在行程結束後侯德健並沒有返臺，而是逕行轉赴中國發展。

然而在中國期間，除了一開始受到官方禮遇，侯德健在當地發展並不順遂，他在自傳中披露，在中國發展初期服務於東方歌舞團，卻捲進文化部與廣電部的利益鬥爭，並得罪東方歌舞團團長，受到利用與排擠，不僅被迫辭職，而後還被文化部封殺，發文警告各省、市地方文化單位不得與之合作，因此當了一年的「黑戶」（意指沒有戶口的人）。侯德健原本期望成立錄音公司始終無法達成，更在1985年因為新專輯《新鞋子·舊鞋子》版權問題向文化部提出侵權，不過也無疾而終（侯德健，1990）。

侯德健曾在1985年提出申請回臺灣，但輾轉到1990年才被「強迫」返臺。1989年他積極聲援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將《龍的傳人》歌詞改寫成《民主歌聲獻中華》，再創作《漂亮的中國人》歌曲，表達爭取民主的決心。同一時間他持續接受國際媒體專訪，抨擊中共霸道與專制，使得原本就被中共政府列為問題人物的侯德健最終被遣返臺灣，於1990年6月19日中共派遣邊防巡邏艇載他至臺灣附近水域，攔了一艘臺灣漁船將他偷偷遣送。

中美斷交、愛國熱潮，壓抑的創作環境構成侯德健潛赴中國的背景條件，而在事件初期以及他在中國發展的境遇，則成為主流媒體的重要新聞線索。本研究選擇主流報紙為樣本，在於報紙做為當時主流媒體之一能夠很好的呈現戰後臺灣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社會結構。在威權政府與報禁時期，報紙除了要注意報導內容是否過於敏感引發執政者不悅；還必須迎合閱聽眾口味，競爭訂閱量，因而更能夠反映官方與民間之間的社會矛盾。本研究挑選中央日報、中國時報、民生報、自立晚報與聯合報五家報紙，這些報紙發行量在當時報業位居龍頭，且涵蓋不同的性質。《中央日報》為官方媒體，《中國時報》與《聯

合報》與國民黨關係良好，《民生報》為商業軟性報紙，《自立晚報》則以勇於報導敏感新聞著稱（王天濱，2003；江詩菁，2007）。因此藉由分析主流報紙對侯德健事件的報導，預期能夠更為貼近 1980 年代臺灣政治與社會結構、媒體與國族認同之間的互動樣貌。

透過事先瀏覽事件報導相關內容，本研究將報導區分成兩個階段分析，前期（1983 年）觀察報紙如何論述侯德健的出走，後期（1984 年至 1987 年）則觀察報紙如何再現侯德健到中國發展的境遇，請參考表 2。

表 2：各報在事件初期及後期的報導篇數

報紙	篇數	
	前期 (1983.6.1-1983.12.31)	後期 (1984.1.1-1987.12.31)
中央日報	0	1
中國時報	1	2
民生報	6	13
自立晚報	4	3
聯合報	5	4
總篇數	16	23

伍、見尾不見首：報導中龍的消失與再現

在本節透過分析新聞文本的內容細節（字、詞、段落），整理出各報紙所欲凸出的重點，並加之歸納、概念化為論述特徵。

一、事件前期「去政治化」的論述特徵

1983 年 6 月 6 日，國內《聯合報》率先披露侯德健到中國之後，第一時間所有報紙引用消息來源共同指向「新聞局」。《中國時報》新聞標題〈民歌手侯德健傳赴大陸 新聞局無確實資料 尚未決定如何處理〉，跟《自立晚報》〈「龍的傳人」侯德健 傳已入大陸「進修」[新聞局]查證如屬實將依法處理〉，³ 彰顯新聞局做為消息來源的重要性（中國時報，1983.6.7: 3；自立晚報，1983.6.7: 2），而其他報紙在事件初期亦以新聞局消息為依歸，請見表 3 整理。繼之，

在報導內容則反映出政府單位對侯德健出走感到手足無措，得出「新聞局無確實資料，尚未決定如何處理」一致性的採訪內容（中國時報，1983.6.7: 3；自立晚報，1983.6.7: 2、1983.6.8: 2；聯合報1983.6.6: 3、1983.6.10: 3）。

表 3：事件初期報紙新聞消息來源整理

報別	日期	消息來源（依報導引用順序排列）
中國時報	1983.6.7	新聞局*、家屬、唱片公司、當事人
自立晚報	1983.6.7	新聞局廣電處*
自立晚報	1983.6.8	有關方面、新聞局*
聯合報	1983.6.6	左派報紙、新聞局廣電處*
聯合報	1983.6.10	中國新聞社、新聞局*

註 1：聯合報引用「左派報紙」應指中國新聞社。

從報導量來看，五家報紙在事件前期報導量加總只有 16 篇，以侯德健及其出版歌曲在當時臺灣社會家喻戶曉的程度，反倒是彰顯主流報紙意圖淡化事件的重要性。這從新聞版面觀察也能夠窺見相同的意圖，事件初期只有《自立晚報》將侯德健出走作為頭版與二版報導，其他四報則放置於三版之後，《中央日報》甚至選擇獨漏侯德健出走的任何報導。

無論事件初期、後期，同屬聯合報系的《民生報》（6 篇、13 篇）與《聯合報》（5 篇、4 篇）在報導量都位居前兩名。《民生報》定位為生活娛樂報紙，其與侯德健相關的報導都放在綜藝娛樂版；而《聯合報》相關報導亦多半放在綜藝娛樂版，凸顯主流報紙的淡化處理除了在報導數量的處理，聯合報系更試圖沖淡事件的政治色彩，將侯德健歸類為演藝人員而非政治人物。請見表 4 版面整理。

表 4：報紙在事件前、後期報導版面安排整理

報別	中央日報		中國時報		民生報		自立晚報		聯合報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前	後
版面／時段										
一版	0	0	0	0	0	0	1	0	0	0
二版	0	0	0	0	0	0	2	2	0	1
三版	0	0	1	1	0	0	0	1	2	0
五版	0	0	0	1	0	0	0	0	0	0
綜藝娛樂	0	0	0	0	6	13	0	0	3	3
副刊	0	1	0	0	0	0	1	0	0	0
總和	0	1	1	2	6	13	4	3	5	4

註 1：本研究將《民生報》的家庭與消費版、影劇新聞版、運動天地，都歸類在綜藝娛樂部分。

從內容觀察事件初期報導的論述立場，照理來說，侯德健逕赴中國已經違反當時行政院公佈的法規《附匪影片公司廠商及附匪影人審定辦法》，但是報紙傾向以「去」、「到」、「赴」、「進入」、「抵達」、「前往」等中性詞彙表達，且沒有加以評論（中國時報，1983.6.7: 3；民生報，1983.6.9: 10；聯合報 1983.6.6: 3），與政府採取中性的回應相呼應。可見政府沒有確認與定調事件性質之前，主流報紙抱持謹慎態度，並未加以評論與表明立場，這似乎有違常態，按照當時從國家到媒體宣傳一致反共的行為，應該會大肆數落這些「叛國」同胞。僅有《自立晚報》以「變節」形容侯德健的行為（自立晚報，1983.6.12: 2）。

除了採用中性口吻陳述侯德健出走的事實，報紙接著推論他的出走動機，首先從中國新聞社取得第一手消息的《聯合報》，便報導侯德健到中國的動機在於「蒐集材料」與「學習作曲」，特此澄清與政治無關：

據香港左派報紙的說法，侯德健到中國大陸，是要去蒐集民歌材料，並赴北平的音樂學院學作曲，沒有任何政治因素。（聯合報，1983.6.6: 3）

《民生報》則是以傳記體的形式，敘述侯德健的背景、個性、經

歷，並將他潛赴中國的理由歸因於個人動機。報導開頭，便將侯德健比擬為卡謬《異鄉人》男主角莫梭，強調侯也是一位行徑「荒謬」而無邏輯的怪人。接著，說明侯德健成長於缺乏溫情、貧困的家庭，造就了他自卑而又自尊心強的人格，並轉而將「創作」視為第一目標。再加上侯德健對於中國山河風景抱有情懷與幻想，最終導致他做出潛赴中國的行為。該報導暗示了家庭背景、個人特質、創作慾望與幻想是侯德健出走的主要動機。以下節錄幾段：

卡謬的「異鄉人」在返家奔喪（母喪）期間，了無悲傷之情，且隨便與一女子苟合。然後，又在海灘上無故擊斃一位陌生男子[sic]。入獄之後，又拒絕作有利於己的申辯[sic]。他是存在主義所說的「荒謬的人」，侯德健也是。……「黃河落日長城月」、「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策馬長城外」、以及「鶯飛草長的江南」，一直是侯德健嚮往的地方。他的「還我山河，山河還我」歌詞中，曾有強烈的暗示。（民生報，1983.6.9: 10）

因此可見《聯合報》與《民生報》都將侯德健出走的行為「個人動機化」，避開政治因素。

在四大報之外，《自立晚報》則出現差異化的報導。如前所述《自立晚報》將侯德健事件置於頭版與二版，凸顯事件的重要性，它亦首先使用「變節」一詞形容侯德健出走的行為，早於政府與其他報紙先一步定調事件性質。此外，《自立晚報》還點出雖然政府仍維持禁止國民到中國的法令，然而一般民眾趁著出國旅遊轉赴中國，已經屬於半公開的秘密。但因為侯德健的情形特殊，如前言提到他被政府吹捧為愛國青年典範，因此他的出走對臺灣政治與社會一定的衝擊：

不過，這項傳聞仍然引起國人對政府一貫強調的不與中共接觸的既定政策，產生一些新的衝擊……目前的情形是，許多市井民眾，因為思鄉或其它理由，趁著出國觀光之便，偷偷到大陸走一遭……侯德健的情形就有點特殊，他並沒有入外國籍，他在年輕一輩的心目中，有一定的名氣，他的一舉一動，受到相當的矚目……（自立晚報，1983.6.8: 2）

與其他報紙的論述策略相悖，《自立晚報》反過來強調事件的政治色彩，它刊載讀者高大鵬的投書，內文將侯德健出走的動機歸咎於集體的懷鄉情懷，並把行文重點放在辨析「地理中國／情感中國」與「政治中國／文化中國」的差異。高大鵬從「道統」的傳承強調位於臺灣的中華民國承繼了儒家文化，而位於中國的中國共產黨則推動反儒家文化（應指文化大革命），最後則指出孕育侯德健的是臺灣這塊土地（以淡水河譬喻）。以下節錄部分篇幅：

當然，近些年來到大陸去訪問的學人數不在少數，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基於鄉愁，……由「龍的傳人」來看，他的民族感情是很強烈的，很沉鬱的，那一股濃烈澎湃的鄉愁，當是促使他回鄉一探的主要動機。當他終於看見夢中的黃河的時候，應該說：「余願足矣！」而即刻買棹歸航了吧！但如果他把一片錦繡河山和上面的統治者混為一談，那就未免「溫柔敦厚」而「失之也愚」了！……再者，民族感情不光是血統上談，也要有文化上的傳承，中國之民族主義不同於西方種族主義者主要在此。……今天共黨所為更是有史以來反文化的最高潮，它在知識上的落後將成為日後中國的致命傷，就憑這一點，他們就愧對「龍的傳人」這四個字。……伊甸園中的龍不耐庸俗的樂利而嚮往外界的「革命」，這是千萬不可輕嘗的紅蘋果。要想想，一個人憑著唱民歌而能受重視，遊大陸，這種「特權」正是伊甸所賜，是伊甸裏的園丁辛苦所賜。除非彼岸有一天也能變成為「伊甸」，否則那裏是絕對養不起，也容不下什麼龍的，回來吧，龍的傳人，淡水河的柔波並不會委屈了你，而養育你成「龍」的，不正是她嗎？歸來吧！（自立晚報，1983.6.13: 10）

二、事件後期「反共產黨」的論述特徵

而侯德健在中國的境遇，日後則構成新的媒體論述，報導口吻一改中性態度，轉而強化潛赴中國的負面意象，主流報紙在事件後期選擇負面詞彙「悲鳴」、「執迷不悟」、「失去自由」、「統戰玩偶」、「生活拮据」、「怨天尤人」描述侯德健在中國的遭遇（中央日報，1987.6.26: 10；中國時報，1985.3.24: 16；自立晚報，

1984.7.26: 2；聯合報，1987.6.8: 2）。

在事件發生歷經一年之後，《民生報》採訪侯德健好友李建復，並以〈「蜜月」期已過 由大套房「下放」小宿舍〉為副標題，強調在短期的禮遇後，他在中國的待遇便急轉直下。該報導內容刻意強化兩個訊息：第一，在共產極權社會，沒有所謂的言論自由、行動自由權利；第二，侯德健對於中共來說只有統戰的利用價值，當雙方蜜月期過之後則面臨「下放」的命運，讓讀者不免聯想到文革期間遭批鬥、勞改的知識分子。節錄內容如下：

「聽說他從北平大飯店的套房裡，不但被『調配』到二流的旅館，最近更搬到『東方歌舞團』的宿舍去，失去行動自由，我想和藝工隊差不多。」[以上為李建復說]……但由於侯德健一向言行隨便慣了，在共產極權社會中，缺少顧及別人立場的警覺性，因此在大陸為朋友帶來嚴重的後果，使他更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人」。……侯德健是去年六月四日自香港進入大陸，短短一年時間，他的「利用價值」就被榨乾了，……（民生報，1984.7.26: 11）

有趣的是採訪報導刊登後，李建復旋即來信澄清報導有誤，強調他並沒有說「失去行動自由」等語：

唯其中幾句「……搬到『東方歌舞團』的宿舍去，失去行動自由，我想和藝工隊差不多」，與我的原意不合，我的意思是「我猜想『東方歌舞團』的性質和我們國內藝工隊的性質差不多」，而非「失去行動自由與藝工隊差不多」，兩者之間極易引起誤會，盼將來函照登，以為澄清，不勝感激！（民生報，1984.7.27: 11）

以上兩篇報導彰顯《民生報》刻意強化侯德健在中國發展的負面境遇，將李建復的採訪內容添油加醋，其扭曲原意程度之大，導致受採訪人還特此發函澄清。

再隔年侯德健應邀參與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頒獎典禮，期間接受訪問，《民生報》與《聯合報》同時引用侯德健對中國體制的批評：「不知道誰是我的老闆、該向誰負責，在臺灣，我理解那個社會與人

際關係，但在大陸我不了解，當發覺沒法把工作做好時，只好辭職。」（民生報，1985.3.24: 11）、「大陸的政治體制不適合我，各方不同的意見令我無所適從，不知該向誰負責才對。」（聯合報，1985.3.24: 12），以致於承認「前往大陸是極大錯誤」（聯合報，1985.3.24: 12）。

除此之外，《民生報》以「痛惜美好山河被糟蹋」為副標題，引用侯德健的採訪稿以呈現中國社會的落後形象：「家鄉真是太窮了！鄉親們對我是很熱情，但卻沒有任何東西能款待我，臨走好不容易拿出二十斤花生。他們的盛情使我感到不抱走不行，結果我只好把花生背回了北京」（民生報，1985.5.26: 11）。家鄉的親友雖然熱情，但卻是阮囊羞澀，唯有硬擠出來的「薄禮」贈送侯德健。而「美好山河」被誰破壞？家鄉為何貧窮如斯？其實不言而喻。

相隔四年，侯德健更被形容為中共廢棄的「統戰玩偶」，他在中國接連碰壁的遭遇成為報紙批評中共的材料來源，並且用詞呈現愈加嚴厲刻薄的趨勢。節錄內容如下：

四年前的六月四日，由香港轉往大陸的校園歌手侯德健，日前在香港向新聞界公開抱怨生活拮据，才華被抹煞，已成為中共廢棄的「統戰玩偶」……侯德健在接受香港新聞界採訪時說，他在大陸上的生活與精神非常痛苦，更抱怨中共制度的缺失與弊病、共幹顛預醜態，使年輕一代，完全無法發揮所長與理想（聯合報，1987.6.8: 2）。

綜合這些報導，論述方式強調（1）共產中國對於言論自由、行動自由的限制；（2）臺灣人在共產體制生活所顯現格格不入的困境；（3）以統戰作為拉攏臺灣人的目的，同時也在目的達成或結束後隨時拋棄；（4）中國當權者無能以致於經濟發展的落後。這都凸顯臺灣與中國的差異，作為警示臺灣人企圖投共的寓言與教條樣本。

再者，事件初期獨漏這起事件的《中央日報》，卻選擇在此時刊登高大鵬的讀者投書。跟 1983 年 6 月投書《自立晚報》的論述方向一致，該投書表示侯德健到中國尋根的錯誤，「發現故鄉有形的『根』，並不足以安身立命」（中央日報，1987.6.26: 10），因為他無法區別出「地理中國」與「情感中國」兩者之間的差異：

然而，「龍的傳人」之所以會終於失望，在於它的「認同」僅止於血性，而未及於理性，僅止於地理的層次，而不及於義理的層次，而沒有看見形而上的道情。……而在中國傳統的觀念裏，道之所在，國之所在，道之所喪，國之所亡，一個國家能否教人認同，關鍵在於有道無道，而不在於有土無土、人多人少（中央日報，1987.6.26: 10）。

除此之外，引用「易經」、「五德終始論」、「緯書」來共同強調「道統」的重要性，暗指中國雖然是龍的發源地，但真正傳承龍的精神、真正繼承道統的則是暫居臺灣的中華民國，而相信「唯物論」的共產體制則不可能有龍的存在。始終沒有報導侯德健的《中央日報》，在這個時刻選擇刊登讀者投書，用意可想是強調投共的錯誤舉動與負面結果。

然而侯德健在中國生活經驗難道只有抱怨嗎？《自立晚報》記者李永得與徐璐，是第一批赴中國採訪的臺灣記者，他們在中國期間採訪侯德健，得到他本人的第一手回應，雖然也表達對中國的不滿：「好？怎麼會好？台北市什麼樣的生活水準，台北還有民主和司法獨立，……」但他也讚揚：「中國大陸提供給藝術家一個很好的創作環境——因為生活、住宿一切都不必掛慮。」（自立晚報，1987.9.24: 2）相比其他報紙，《自立晚報》將侯德健對中國的觀點正反並陳。

四、小結

整體而言，在事件初期，透過消息來源、報導數量、版面安排、論述策略的分析，彰顯主流報紙對事件採取中性報導與淡化處理。報紙全然不討論侯德健因為創作《龍的傳人》歌曲而成為各界熟知的愛國歌手相關事蹟。而《中央日報》作為官方媒體，選擇獨漏事件報導，則直接代表政府處理事件的低調姿態，主流報紙無論是將侯德健定位為一般演藝人員，或是將侯德健的行為歸因於純然的個人動機，以及獨漏事件報導，都共同指向論述方式的「去政治化」特徵。

而《自立晚報》的差異化報導，彰顯該報被視為當時敢於批判政府的稀有報紙。相對於他報，《自立晚報》既不中性報導，將潛赴中國形容為個人認同的變節；也沒有淡化處理，以頭版、二版大肆刊登侯德健的出走。最後更是點出事件背後所透露非純屬個人行為，而是

嚮往中國所出現的集體行為，這使得讀者能夠窺探事件所涉及的層面應是更為複雜且參雜著政治認同因素。

事件後期的報紙，五家報紙的立場則相比前期較為一致，凸顯反共產體制的論述特徵。主流報紙不再拘泥於去政治化的論述策略，反而更多著墨侯德健在兩岸之間政治與認同選擇的錯誤。報紙從政治（中共只為統戰目的）、人權（沒有言論跟行動自由）、經濟（生活水準低落），到使用中國傳統王道觀念（易經、五德終始論、緯書），除了凸顯侯德健在中國的悲慘遭遇，具有告誡國人勿擅自到中國的警示效果；還傳達了代表中國整體與中國文化並非是中國共產黨所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是位於臺灣正統的中華民國。

再者，本研究考慮在當時報禁的高壓環境，報紙是否能夠完整呈現侯德健事件的討論面向？是否還有其他論述？下一節本研究觀察同樣針對事件有更多報導與評論的黨外雜誌，以及侯德健自傳，兩者做為當時不同論述的補充，並透過比較凸顯主流報紙所欲傳達的意識形態。

陸、揭露龍的全貌：黨外雜誌與侯德健自傳做為不同論述的補充

相對於主流報紙而言，當時的黨外雜誌在事件初期也同樣關注侯德健潛赴中國的動機。若將主流報紙對於原因的說明歸納為蒐集材料、學習作曲，以及個性極端等去政治化的因素，則黨外雜誌則圍繞「政治」與「認同」因素展開討論。

在政治因素，黨外雜誌論述侯德健的出走可能直接來自於對政府音樂審查制度的不滿。例如在潛赴中國前夕，侯德健的原創歌曲數次遭新聞局禁播，還被政府要求寫「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歌」，而他的名作《龍的傳人》更被當時新聞局長宋楚瑜擅自改詞，用以呼籲年輕自強不息，引發侯德健的反感（林容，1983年6月18日；楊祖珺，1983年6月11日），然而這些故事在主流報紙卻沒有任何著墨，顯見其避談任何政治因素。後來在侯德健（1990）的自傳中，表明宋楚瑜、新聞局跟文工會的「邀請」改詞作曲，雖然是促使他決定暫時離開臺灣迴避的動機，但選擇到中國則是來自另一因素——「政治認同的轉向」。

首先，《前進》雜誌刊登楊祖珺對侯德健出走動機的探討。做為侯德健在淡江大學時期的學姐，提及她曾與侯德健在參與泰緬志工服務隊過程中醒悟，當權者利用年輕人的愛國熱忱達成反共宣傳的作秀心態。在泰緬之行，他們發現電視上看到勞苦的反共游擊隊員和中國人權協會郊遊的錄影都是刻意營造，而在泰緬邊境早已沒有反共戰爭：

泰緬邊境的鐵三角地帶，早已多年沒有戰爭。由於當初流亡山區的游擊隊後代已在那兒生活下去，一時却無法移居、改行了。他們的貧苦沒有知識，緣於愛國反共……，一九八〇年的「中國人權協會」，是到最不危險、最沒有病害的越南難民區去，這和他們當初召集人馬的講法有很大的出入。（楊祖珺，1983年6月11日，頁18）

因此楊祖珺認為侯德健之所以到中國，是因為他對國民黨政府感到悲觀，於是他要超脫當權者的控制，轉而尋求其他管道以追求心中嚮往的中國：「他要突破、他要反省，已經被從政者『利用』了的『龍的傳人』，勢必再度為那邊的從政者『利用』，侯德健只是一個政治夾縫中，尋找『中國人』三個字所代表的真正意義。」（楊祖珺，1983年6月11日，頁18）

《夏潮論壇》轉載自《百姓雜誌》對侯德健的訪談內容，在這篇1985年5月侯德健出走前夕的訪談，則殊途同歸地說明他想要超脫「國共對立」的意識形態框架：

我的敵人不是一個特定的人，而是一種狀態，一種心態，就因為這種狀況和心態，造成今日中國人的分裂！中國人的分裂！中國人的分裂又把這種心態嚴重化。我甚至覺得共產主義也不是我的敵人。（張楚勇，1983年7月30日）

簡而言之，國共對峙才是造成中國分裂的罪魁禍首，因此侯德健認為共產主義也非真正的敵人。侯德健構想的國族定義，與國民黨「官方中國意識」產生差異。他並不反共，他的中國意識包含所有中國同胞，是出於血脈而非政治的認同。

楊祖珺觀點與《百姓雜誌》對侯德健的訪談內容，跟侯德健自傳

對於潛赴中國動機的白白不謀而合，他自述：

七年前，我到大陸，和十年前，我到泰東邊區的難民營去的思想背景，是同一個想法——去積極追求作一個中國人的意義。……這是臺灣國民黨在我這一代人身上，推行民族主義教育的必然結果（侯德健，1990，頁 107）。

細讀侯德健的自傳，可見他極為反對以特定框架限縮的愛國教育（例如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官方愛國主義），他將之稱為「狹隘的民族主義」、「泛愛國主義」，在愛國主義之外，他更加重視全中國社會的福祉。

林世民以〈龍沒有穿衣服〉為題刊登於《前進》雜誌，他亦將侯德健的例子視為國民黨愛國教育所必然造就的集體現象：

執政黨推行的民族主義，是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對十億人談十億人的民族主義，或許不會帶來太大的困擾。但不幸的是，執政黨沒有辦法對十億人談……，把十億人的民族主義壓在一千八百萬人頭上，我們還能期待什麼好的後果？這就像是把三千公斤的重擔扔到一個人的身上；他除了逃離這個擔子（「臺獨」），或是爬到這個擔子上面，讓自己也變成擔子的一部分（「跑到中國大陸」），還能做什麼？侯德健跑到大陸，不正代表執政黨推行的民族精神終於在他心中萌芽了嗎？（林世民，1983 年 6 月 18 日，頁 15）

林世民戳破國民黨政府已沒有能力反攻大陸，且繼續推行中國國族主義的教育則顯得不合時宜，然而就如標題「龍沒有穿衣服」所諷刺的，執政者卻渾然不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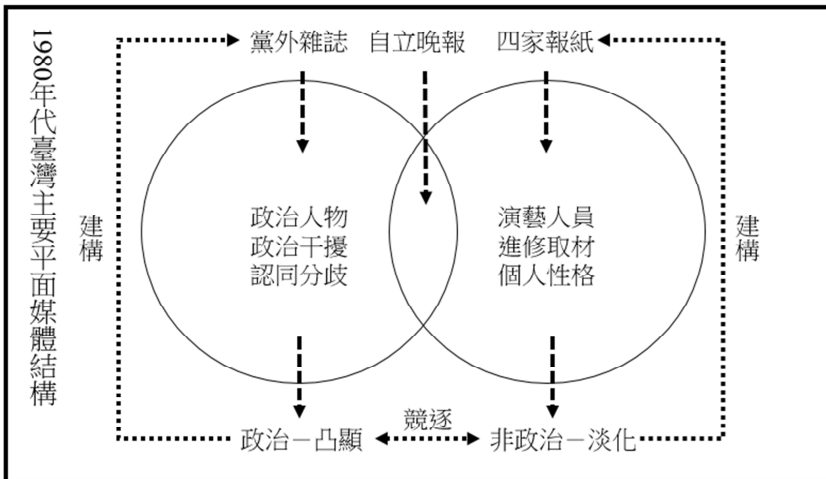
在 1980 年代臺灣平面媒體結構，黨外雜誌的出現目的便是尋求以政府為代表的主流媒體之外的突破口，無論在選舉宣傳、政策批評、國家定位，都能看見黨外雜誌與主流媒體之間的論述競逐。相比報紙嚴格管制，雜誌的篇幅與申請數量則沒有嚴格的限制。1970 到 1980 年代的黨外雜誌便利用管制漏洞，發表時政評論、反國民黨言論。這些雜誌就算被迫停刊，也早就準備了其他「備胎雜誌」替補，借殼還魂。例如《前進》週刊在 1983 年 8 月 6 日被迫停刊，立即就

有《前進廣場》推出創刊號，接續出刊（胡慧玲，2013）。

對應當時的政治背景，1980年代國民黨政府處於內外交逼的困境，其一是黨外運動風起雲湧、其二是同盟國家紛紛斷交。在社會背景，1970年代保釣運動影響知識分子的左傾，以及1980年代本土意識浮上檯面（參考文獻回顧第三節），針對侯德健出走動機的推測，無論基於政治或認同因素的報導策略，都不利於國民黨維持國家認同與統治穩固。當時除了侯德健潛赴中國，還包括軍人林毅夫、黃植誠、李大維、導演李翰祥、機長王錫爵等，形成一股往中國走的集體現象。特別是侯德健具有「愛國」與「藝人」的雙重身分，並且「家喻戶曉」，於是主流報紙的論述策略是，將侯德健放在演藝人員而非政治人物的位置，以非政治／認同因素論述侯德健到中國進修取材，企圖淡化他在一般人民心中的政治與愛國形象，其目的便在於降低事件對社會的衝擊。

相反的對於黨外雜誌而言，強化事件的政治性質更能夠達到揭穿社會真相，撼動國民黨的專制政權與意識形態教育，藉由事件說明1980年代國民黨政權對演藝人員的干預、社會產生認同分歧的實情，以及國民黨長期灌輸中國國族主義教育的不合時宜（讓更多認同中國意識的臺灣民眾偷渡到中國）。主流報紙與黨外雜誌的論述特徵整理如圖2：

圖 2：侯德健事件主流報紙與黨外雜誌論述策略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唯事件後期侯德健在中國發展處處碰壁，反倒成為有利於國民黨政府宣傳反共愛國的新聞線索，無論是否為侯德健與中共官員的私人恩怨，主流報紙皆刻意將侯德健的悲慘處境與共產極權體制連結在一塊，強化投共下場悲慘的教條樣本，也因此事件後期的報導策略有別於前期，挪用侯德健在中國的負面境遇強化反共意識形態框架。

柒、1980年代認同矛盾與社會特徵

一、研究結果與發現

透過互文性分析，本研究發現主流報紙透過吸納、重組與排除，來強化報社試圖彰顯的論述面向。例如事件初期挪用卡謬《異鄉人》的故事內容，將侯德健比擬為故事主角般具有荒謬而極端的人格特質，強化讀者對事件發生屬於純屬個體行為的意象。而事件後期因為侯德健在中國不順遂的遭遇，則受到主流媒體大肆報導，使用「下放」、「統戰」等詞彙與侯德健的遭遇並置，強化讀者對投奔中國後果的負面意象，做為警世的教條樣本。「下放」一詞容易召喚了文革期間知識分子遭到批鬥、勞改並下放至農村的想像經驗，而「統戰」則是國民黨政府長期灌輸臺灣社會，中國共產黨針對臺灣所做的一系列措施（無論好壞）的背後目的皆汲汲營營於統一臺灣。除此之外，報紙引用「易經」、「五德終始論」、「緯書」強調道統的重要性，相比於中國共產黨推動文化大革命，中華民國則推行文化復興運動，承繼了中華文化的道統。該論述與國民黨所推崇的「中國國族主義歷史敘事」形成互文脈絡，認為中華民國統轄的人民才是炎黃子孫，從秦漢唐宋元明清到中華民國是我國歷史的朝代演變，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孫蔣是我國文化思想內涵的傳承（葉春嬌，2010）。

再者透過不同論述視角的比較，可以發現同樣在探討侯德健潛赴中國的動機，主流報紙刻意排除政治與認同因素，包括當時音樂審查制度、文工會、新聞局對於創作的限制與干擾；還有最為貼近侯德健自述的動機——擺脫國共對立意識形態框架的認同意識抉擇。就如本文開頭所言，侯德健的例子並非個案，他反映出當代集體對於「情感中國」與「政治中國」的矛盾心態。而《自立晚報》則展現差異化的報導，在其他報紙尚未定調事件性質，且採取淡化處理時，《自立晚報》優先以「變節」形容侯德健的行為，且將事件以頭版刊出。該報

還描述侯德健的出走並非單純來自個人動機，而是臺灣社會嚮往到中國的集體行為的一個縮影。再者，《自立晚報》在報導中提到「淡水河」做為養育侯德健的土地，以擬人化的「她」指稱淡水河，則可能召喚讀者思考「何謂祖國」（臺灣／中國）的認同歸屬想像。

作為對照的黨外雜誌，則露骨地彰顯事件的政治性質，除了探討侯德健出走的政治與認同動機，還直指國民黨在國族精神教育的失敗。乍看之下，主流報紙與黨外雜誌的報導差異如同兩條平行線，但卻是在當時平面媒體結構之中產生文本的互文性與論述競逐。

總體而言，1970 至 1980 年代初期，在官方層面，國民黨政府面臨外交與內政的壓力，在民間層面，則社會在面對斷交與領土紛爭時，開始反思自我認同的歸屬，應而促成鄉土文學論戰與校園民歌運動，其中在論戰內容與民歌運動都同時出現了兩派陣營——中國認同與本土認同。於是國民黨政府為了鞏固統治基礎，加強官方中國意識形態宣傳必然是重要的，而做為官方日報的《中央日報》，以及與國民黨關係良好的《中國時報》、聯合報系旗下的《聯合報》與《民生報》，統一口徑宣傳反共意識形態，並進一步排除不利於執政者的報導。

二、研究貢獻與討論

在批判論述分析的理論貢獻，本研究挑選具有不同性質的主流報紙進行分析，更能夠代表當時論述背後彰顯的社會結構，並在探析文本中的言說鏈及意識型態步驟，加進黨外雜誌與侯德健自傳，從比較不同的論述視角以凸出、解釋報紙的論述策略，如此更能夠觀察到文本之間互相構連而動態的競逐過程。而在研究發現，區別於先前研究聚焦於探究由侯德健出走所引發的臺灣意識論戰（強調臺灣意識浮上檯面），藉由研究主流報紙對事件的報導則反映出另一種 1980 年代的社會現象，即以侯德健為代表的民間的大中國意識縮影，該意識形態在當時與官方反共意識、逐漸檯面化的臺灣意識遙相輝映，再現當時多元的意識形態樣貌。

再者，相對於 1980 年代違法潛赴中國發展的演藝人員（例如侯德健、李翰祥），動機或出於政治認同、或出於創作取材，2000 年代以來臺灣藝人往中國發展則更偏重經濟誘因，然而殊途同歸的是他們都同樣遇到認同困境，被迫在兩個政治實體之間做出認同表態的抉

擇。時間往前一點，1970 年代成名的歌手鄧麗君儘管未曾到中國演唱，但也因為媒體不斷詢問而表明：「大陸沒有民主的一天，她不會到中國大陸去」（陳欣怡，2010 年 5 月 21 日）。本研究認為，若能夠將各年代演藝人員涉及國族認同議題的案例串起來討論（例如 1970 年代的鄧麗君、1980 年代的侯德健與李翰祥，以至於 2000 年代從張惠妹國歌事件開始，層出不窮的臺灣藝人在中國發展被迫表態案例。），將有助於我們理解藝人遭遇到的認同抉擇過程如何彰顯背後演藝環境與政治環境的變化。

最後限於研究篇幅與時間，本研究在蒐集報紙的時間範圍，並沒有包括 1988 年報禁解除以後侯德健事件的相關報導。長期追蹤報紙對同一事件的報導，或許更能夠反映臺灣歷經威權體制到民主體制的轉變過程之內涵。1990 年 6 月 20 日侯德健因為積極參與天安門事件而被中國強制返臺，更引起臺灣媒體大肆報導。期待未來研究能夠朝這個面向進行討論，預期能有更豐碩的研究貢獻。

註釋

- 1 對美國留學生保釣運動「左傾」的原因，主要為 1971 年以來中國與美國關係的改善、兩岸國際局勢的消長；另外還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以及新左派思潮批評美國做為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代表涉入越戰的負面形象，使留學生傾向肯定中國的發展與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並站在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路線（邵玉銘，2013）。
- 2 原詞：「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槍砲聲敲碎了寧靜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多少年砲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地擦亮眼。」
- 3 《自立晚報》標題內[新聞局]三字為作者註明，因報導內文有提到「查證如屬實將依法處理」一話來自新聞局。

參考文獻

- 自立晚報（1983年6月7日）。〈「龍的傳人」侯德健 傳已入大陸「進修」〉，《自立晚報》，2版。
- 聯合報（1983年6月10日）。〈北平發布消息 侯德健抵北平〉，《聯合報》，3版。
- 中國時報（1983年6月7日）。〈民歌手侯德健傳赴大陸 新聞局無確實資料 尚未決定如何處理〉，《中國時報》，3版。
- 自立晚報（1984年7月26日）。〈侯德健失去自由 李建復表惋惜〉，《自立晚報》，2版。
- 民生報（1985年3月24日）。〈侯德健向香港記者表示：大陸待兩年 收穫等於零 想念舊親情 希望回台灣〉，《民生報》，11版。
- 聯合報（1985年3月24日）。〈侯德健在港坦白承認 前往大陸是極大錯誤〉，《聯合報》，12版。
- 自立晚報（1983年6月8日）。〈侯德健行蹤何處 鐵幕內迷霧重重 特殊個案如何處理廣受關切〉，《自立晚報》，2版。
- 聯合報（1987年6月8日）。〈被中共當成玩偶 侯德健懊悔莫及〉，《聯合報》，2版。
- 民生報（1980年7月21日）。〈創作歌謠投票踴躍 「龍的傳人」暫時領先〉，《民生報》，9版。
- 聯合報（1983年6月6日）。〈傳侯德健赴大陸—左報說他抵北平〉，《聯合報》，3版。
- 自立晚報（1980年1月16日）。〈新聞局設歌曲輔導小組將輔導與審查作業改為一次受理申請〉，《自立晚報》，2版。
- 王天濱（2003）。《臺灣報業史》。臺北：亞太圖書。
- 王祖壽（1984年7月26日）。〈嚮往超過了真實 幻象破滅 侯德健在大陸 已無利用價值—「蜜月」期已過 由大套房「下放」小宿舍〉，《民生報》，11版。
- 江素惠（1985年3月24日）。〈真侯德健執迷不悟 假侯德健投奔自由〉，《中國時報》，16版。
- 江詩菁（2005）。〈臺灣八〇年代中國意識與臺灣意識爭奪戰：以兩大報系與黨外雜誌為分析場域（1979-1989）〉，《臺灣文化研

- 究所學報》，2：299-348。
- 江詩菁（2007）。《宰制與反抗：中時、聯合兩大報系與黨外雜誌之文化爭奪（1975~1989）》。新北：稻鄉。
- 艾誠如（1983年6月12日）。〈望天涯·「龍的傳人」何時歸來 侯德健·竹幕「進修」心事誰知〉，《自立晚報》，2版。
- 吳孟芬（2008）。《國小社會教科書族群意識形態之批判論述分析》。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叡人（2001）。〈臺灣非是臺灣人的臺灣不可~反殖民鬥爭與臺灣人民族國家的論述 1919-1931〉，林佳龍、鄭永年編，《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頁43-110。臺北：新自然主義公司。
- 吳叡人譯（2010）。《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臺北市：時報。（原書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NY: Norton.）
- 宋楚瑜（1980年8月5日）。〈龍的傳人 有爭氣的國民 才有爭氣的國家〉，《聯合報》，8版。
- 李永得、徐璐（1987年9月24日）。〈侯德健翩然來訪·劈口吐苦水 心繫台灣盼歸巢·還是台北好〉，《自立晚報》，2版。
- 李金梅、黃俊龍譯（2001）。《國族與國族主義》。臺北市：聯經。（原書 Gellner, E.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李建復（1984年7月27日）。〈來函〉，《民生報》，11版。
- 李筱峰、林呈蓉（2005）。《台灣史》。臺北：華立。
- 林世民（1983年6月）。〈龍沒有穿衣服〉，《前進》，12：14-15。
- 林世達（2010）。《台灣化與去中國化—高中歷史教材台灣史書寫的批判話語分析》。臺灣師範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容（1983年6月18日）。〈官員！官員！你擦亮眼！〉，《前進》，12：9。
- 邱婕歆、吳連賞（2017）。〈從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再定位教師角色〉，《教育學誌》，38：101-123。
- 邵玉銘（2013）。《保釣風雲錄：一九七〇年代保衛釣魚台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臺北：聯經。

- 侯德健（1978年12月26日）。〈龍的傳人（歌詞）〉，《聯合報》，12版。
- 侯德健（1980年8月27日）。〈我寫「龍的傳人」〉，《聯合報》，8版。
- 侯德健（1990）。《禍頭子正傳》。新北：聯經。
- 姚竹音（2016）。〈揭開習以為常的認同與差異：「部落的呼喚」得獎作品之後殖民批判論述分析〉，《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教育類》，10(1)：60-85。
- 施敏輝（1988）。《台灣意識論戰選集》。臺北：前衛。
- 洪郁如、陳培豐譯（2014）。《戰後台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臺北市：臺大出版中心。（原書 若林正丈 [2008].《台湾の政治——中華民国台湾化の戦後史》。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
- 胡慧玲（2013）。《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 卷三 民主的浪潮》。新北：衛城。
- 倪炎元（2011）。〈批判論述分析的脈絡與建構策略：Teun A. van Dijk 與 Norman Fairclough 的比較〉，《傳播研究與實踐》，2：83-97。
- 倪炎元（2012）。〈批判論述分析的定位爭議及其應用問題：以 Norman Fairclough 分析途徑為例的探討〉，《新聞學研究》，110：1-42。
- 涂敏恆（1983年6月9日）。〈侯德健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民生報》，10版。
- 高大鵬（1983年6月13日）。〈伊甸之龍〉，《自立晚報》，10版。
- 高大鵬（1983年6月26日）。〈龍在何方—侯德健的悲劇〉，《中央日報》，10版。
- 張楚勇（1983年7月）。〈侯德健論中國大陸與台灣—訪《龍的傳人》作者侯德健〉，《夏潮論壇》，6：30-31。
- 陳佳宏（2006）。《台灣獨立運動史》。臺北：玉山社。
- 陳欣怡（2010年5月21日）。〈【何日君再來】女孩走上世界舞台 鄧麗君傳奇！〉，《TVBS NEWS》。取自 <https://news.tvbs.com.tw/local/93172>

- 陳映真（1984）。〈鄉土文學的盲點〉。陳映真《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頁 17-23。新北市：遠景。
- 陳昭瑛（2009）。《臺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 陳培豐（2006）。《「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
- 陳翠蓮（2008）。《台灣人的抵抗與認同》。臺北：遠流。
- 湯志傑（2007）。〈勢不可免的衝突：從結構／過程的辯證看美麗島事件之發生〉，《台灣社會學》，13：71-128。
- 黃彥文、姚明俐（2017）。〈霸權的轉移：高中歷史課綱微調事件之論述與再製〉，《教育學報》，45(2)：25-42。
- 楊祖珺（1983年6月11日）。〈巨龍！巨龍！你瞎了眼！〉，《前進》，11：17-18。
- 葉月瑜（1999）。〈影像外的敘事策略：校園民歌與政宣電影〉，《新聞學研究》，59：41-65。
- 葉石濤（1979）。〈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總序〉，鍾肇政、葉石濤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①：一桿秤仔》，頁 7-35。臺北：遠景。（原文以〈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刊載於 1977 年 5 月《夏潮》第 14 期。）
- 葉石濤（2003）。《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
- 葉春嬌（2010）。《國族認同的轉折：台灣民眾與菁英的敘事》。新北：稻鄉。
- 蒲叔華（1985年5月26日）。〈「回歸」夢醒已惘然！侯德健再從「零」開始〉，《民生報》，11版。
- 劉北成譯（1992）。《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臺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9].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NY: Vintage.）
- 潘志煌（2011）。〈臺灣新移民子女課程政策變革之批判論述分析〉，《國民教育》，51(6)：18-30。
- 蔡篤堅（1996）。〈對 1980 年代台灣民族認同形成的文化分析〉，收錄於張憲炎、陳美蓉、黎光中編，《台灣近百年史論文集》，頁 303-330。臺北：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鄭怡世（2019）。〈揭露文本的沉默性：以批判論述分析方法應用於

- 「曹小妹事件調查報告」為例〉，《臺大社會工作學刊》，39：57-104。
- 蕭阿勤（2012）。《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臺北：聯經。
- 賴英泰（2012）。《二十一世紀初期台灣電影裡的論述與認同——以魏德聖導演的《海角七號》與《賽德克巴萊》為例》。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碩士論文。
- 蘇蘅（1993）。〈語言（國／方）政策型態〉，鄭瑞城等合著，《解構廣電媒體：建立廣電新秩序》，頁 219-278。
- Anderson, B. (1991/2007). Imagined communities: nationalism's cultural root. In S.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3rd edition (pp. 253-263). London & NY: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06). *Language and globalization*. London, UK: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UK: Longman.
- Hsu, C.-J. (2013).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Taiwan's media, 1896-2012*. Leiden, NL: Brill.
- Wodak, R. (2001). What CDA is about: A summary of its history, important concepts and its developments. In R. Wodak & M. Meyar (Eds.),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pp. 1-13). London, UK: Sage.

Artist with Subjective Interpretations: Media Discourse Strategies in the Case of Hou Dejian's Return to China in 1983

Jia-Min Yang*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incident of Hou Dejian's return to China in 1983, this research explores how mainstream newspapers (*the Central Daily News, United Daily News, Min Sheng Bao, and Independence Evening Post*) involved the complex of national identity when reporting the event. This paper employs Fairclough'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different political tendencies of news outlets, ideological constructs, and social context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newspapers initially tended to personalize the incident of Hou's return but later uniformly criticize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research compares the different discourses from Tangwai magazines and Hou's autobiography and notes that mainstream newspapers avoided reporting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issues pertaining to the incident. Finally, Hou's Chinese consciousness differs from the official nationalism and is indicative of the various national identities prevalent in the 1980s.

Keywords: Chinese consciousnes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Hou Dejian, mainstream newspaper, Tangwai magazines

* Jia-Min Yang is Postdoctoral fellow at Center for Service Innovation and Mobility Design, Feng Chia University, Taiwan.